

中国新时期儿童文学的深层拓展^{*}

王泉根

(北京师范大学 中文系, 北京 100875)

摘要: 新时期儿童文学以其开放性、创造性和丰富性, 将中国儿童文学推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其深层拓展的表现有三: 一是突破了“教育工具论”的束缚, 确认儿童文学具有多元的价值功能和美学目的, 提升作家的使命意识与人文关怀; 二是摆脱了“成人中心论”的羁縻, 确认儿童文学必须以切合少年儿童的精神世界与思维特征为基准的主体性原则, 重建人的意识, 塑造未来民族性格; 三是校正了儿童文学标准单一性与创作现象丰富性之间的矛盾错位, 确认以少年儿童年龄特征与接受心理的差异性来建构多层次的儿童文学分类, 以推进儿童文学创作的发展繁荣。

关键词: 儿童文学; 深层拓展; 发展思潮; 本体自觉; 美学追求

中图分类号: I106.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0209(2000)04-0045-08

中国当代儿童文学与整个中国当代文学一样, 走过了风风雨雨 50 年的曲折道路, 并正在继续行进之中。在前 27 年 (1949- 1976), 由于各种不可抗拒的文学外部和内部的原因, 曾时大时小地干扰制约着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 10 年“文化大革命”达至极点。从粉碎“四人帮”的 70 年代末起, 中国进入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 大文化大环境大气候的变化, 使整个中国当代文学包括它的独立组成部分中国当代儿童文学, 获得了无限宽广的发展空间与蓬勃的生机活力, 呈现出真正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态势。中国当代文学以其开放性、创造性和丰富性为特征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新时期的儿童文学, 冲破了先前公式化、概念化、工具论的樊篱, 经过 10 多年的锻造, 终于获得了满蕴时代精神的美学素质, 并催化为具有思辨特征的观念成果。它已是一个适应不同年龄阶段的少年儿童同化机能的、多层次的艺术载体, 肩负着培育我们民族未来一代精神性格的神圣使命, 在走向少儿世界的同时稳健地走向自我价值的实现与艺术个性的自觉。

新时期儿童文学拓展之一: 突破了“教育工具论”的束缚, 确认儿童文学具有多元的价值功能和美学特征, 提升作家的使命意识与人文关怀

^{*} 收稿日期: 1999- 09- 20

作者简介: 王泉根 (1949-), 男, 浙江省上虞市人, 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 教授。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99BZW 031)。

过去的儿童文学观念，长期习惯于以传统的“教化”信条与共和国特定时期视文学为从属于政治的“阶级斗争的工具”的观念相默契，儿童文学就简单地成了实用主义的教育儿童的工具，甚至认为这是儿童文学的唯一价值与本质特征。“教育的方向性”与“中心任务配合论”长期左右着儿童文学的创作走向，使一种本应呈现出生动活泼的艺术个性的文学成了实施填鸭式灌输的平庸载体，造成如同茅盾在60年代初所批评的那种“政治挂了帅，艺术脱了班，故事公式化，人物概念化，语言干巴巴”的局面^[1]

新时期儿童文学的第一回合是回归文学与回归“五四”。新时期刚开始时，儿童文学的新潮理论将重心放在力纠极“左”思潮影响，与整个文学界冲决拘囿艺术发展的庸俗社会学的樊篱，冲决“阶级斗争工具论”的束缚同步，为冲决儿童文学是“教育儿童”的工具论的束缚作了很大努力。当时提出的一个具有儿童文学自身特色的理论命题是：“儿童文学是文学。”儿童文学应“返本归位”，回到文学版图中来。正如曹文轩的《〈新潮儿童文学丛书〉总序》所说：“所谓‘新潮’，只是反映文学要从艺术的歧路回归艺术的正道。”^[2]（P272）以后理论界又重新评价了陈伯吹的“童心定律”，并展开了诸如儿童文学的趣味性与教育性、成人化与儿童化、少年小说与少年性心理等一系列理论问题的探讨。与此同时，还考察了五四新文化运动中风行一时的“儿童本位论”的历史真相，提出实事求是评价周作人儿童文学观的问题。80年代中后期出版的《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史》（1986）、《现代儿童文学的先驱》（1987）、《中国现代儿童文学文论选》（1989）等现代儿童文学文献与史著，在当时的特定背景下，其价值主要是为了从五四新文化运动那里寻找理论资源，寻找中国儿童文学的传统精神。新时期儿童文学加强了对未来一代的精神性格和民族心理的积淀层次作深广的探究与开掘，强化了对儿童文学认识功能、审美意识、代沟调合、人格形塑、游戏精神乃至未来民族国民性的探求和深思。儿童文学的状况如何，儿童文学作家张扬什么，追求什么，直接关系到中华民族未来一代的“国民性”。儿童文学应当担负起改造国民性、提高未来公民精神素质的重任。在突破“教育工具论”的进程中，儿童文学的创作生产力不断得到释放。因循守旧的板块结构终于被总体骚动、局部深入的艺术新格局所取代，统率这种新格局奔突向前的则是少年小说创作的热流。

率先冲击儿童文学保守局面的是少年小说。在刘心武《班主任》的冲击波影响下，一批年轻的作者以感应生活的敏锐与执着求真的精神，为刚刚复苏的小百花园地催生了一派生意盎然的新绿。王安忆的小说《谁是未来的中队长》以其主题的深刻与毫不吞吞吐吐的写作姿态，引起了儿童文学界的第一阵骚动。这篇“问题小说”在少儿读者以及家长、教师中所激起的异乎寻常的反响，将儿童文学由描写“伤痕”而直接拉入了“反思”。紧跟着，《泥泞的春天》（王一地）、《乱世少年》（萧育轩）、《吃拖拉机的故事》（罗辰生）、《被扭曲了的树秧》（刘岩）、《再见了，我的星星》（曹文轩）……竞相推出。这些作品一反以往的虚饰与陈套，直面人生，拥抱现实，引起了小读者和他们家长的广泛兴趣。儿童文学的新生之光，终于在小说领域首先点燃起来，并一发而不可收，流布成奇云郁起的景观，并很快催化出象征手法、哲理反思、心理体验、悲剧意识以及散文化、荒谬感、意识流等创作现象。在这片活泼轩昂的领域，既有大胆触及时弊、针砭现实，帮助小读者认识和评价“初级阶段”社会世相的“问题小说”，如丁阿虎的《祭蛇》、王路遥的《破案记》、汪黔初的《在县委食堂打饭的孩子们》，也有在广阔的历史背景上反映过去艰苦革命岁月生活的“战争小说”，如严阵的《荒漠奇踪》。

陈模的《奇花》 王一地的《少年爆破队》 张映文的《扶我上战马的人》；既有通过儿童的视角，着力描绘两代人心灵碰撞和理解的“代沟小说”，如关夕芝的《五虎将和他们的教练》 刘霆燕的《老人和黑帽子》 刘心武的《我可不怕十三岁》，也有引导少男少女认识“心理性断乳”所带来的身心剧变，平衡青春期紧张情结的“身边小说”，如陈丹燕的《上锁的抽屉》 秦文君的《少女罗薇》 张成新的《啊，少男少女》 肖复兴的《中学生三部曲》；既有礼赞少年朋友自立自强的阳刚气质勇敢走向人生之路的“小小男子汉小说”，如曹文轩的《弓》 陈丽的《遥遥黄河源》 蔡玉明的《脚下的路》，也有剖析失足少年的命运，拯救迷途羔羊的“工读生小说”，如刘厚明的《绿色钱包》 柯岩的《寻找回来的世界》 任大霖的《喀戎在挣扎》；既有追求小说表现手法的刻意创新与探求的“探索小说”，如班马的《鱼幻》《迷失在深夏古镇中》，也有注重表达作者对生活的独特感受，寓哲理、情理、伦理于一炉的“哲理小说”，如程玮的《白色的塔》《孩子、老人和雕塑》；既有直面成人世界的精神创伤带给孩子世界不幸与痛苦的、令人警悟的“悲剧小说”，如常新港的《独船》 刘汉一的《毛茸茸的胡须》，也有表现人与动物的关系，借助艺术化的动物形象艺术地体现人的本质的动物小说，如蔺瑾的《冰河上的激战》 沈石溪的《第七条猎狗》 乌热尔图的《老人和鹿》，等等。中国儿童文学的小说创作，从来没有出现过像 80 年代那般热闹，那般精彩，那般主题多元与艺术多样的景观。奇葩纷呈的小说创作直接铸就了新时期儿童文学繁荣兴盛的局面。中国作家协会主办的“首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评委们一致认为：小说创作是新时期儿童文学成绩最为显著的门类，“其中一些作品足以与我国目前成人文学中的优秀作品媲美”，以往儿童文学创作中单一的教育性传统与褊狭保守的局面终于被彻底打破，“它体现了作家对我们民族精神新的理解与追求”，体现了儿童文学新的美学理想与艺术性格 [34]

二

新时期儿童文学拓展之二：摆脱了“成人中心论”的羁縻，确认儿童文学必须以切合少年儿童的精神世界与思维特征为基准的主体性原则，重建人的意识，塑造未来民族性格

儿童文学，说到底就是为儿童服务的文学，这是一种强烈地意识到接受对象的规定性与接受对象对文学自身特殊需求的文学。可是，我们在很长一段时期里不敢提也不能提为儿童服务，而只能与当时的成人文学一起大写成人社会的斗争生活与政治运动。虽然从未有人颁布过儿童文学要“为成人服务”的创作纲领，但特定时期的历史文化背景与文化语境，早已将儿童文学牢牢捆绑在以成人意志为走向，以成人运动为中心的功利性、实用性的“宣传车”上。政治教条、斗争哲学、阶级观念已成了童心世界超负荷的重载。为成人政治服务的“儿童文学观”，使儿童文学创作不断为了一致的政治目标而朝成人文学相同的艺术范式靠拢。无论在题材选择、创作方法，还是艺术构思、语言运用等方面，整个创作变得越来越近似；到了“文革”时期，则一致地都崇尚“三突出”，而离儿童世界越来越远，最终也就不再成其为儿童文学了。

进入新时期的中国儿童文学，审视了自己被扭曲的历史，清醒地扬弃了既成的“成人中心主义”及由此带来的苦果，在不断寻找自我的进程中，再造形象，使曾经失落的儿童本位观念得到复归，把颠倒了的服务关系重新颠倒了过来。这种复归直接体现在对儿童文学的接受对象——少年儿童精神世界的深层把握与多维表现上，体现在对少年儿童的人格独立性、自

主性、自尊心、自信心的尊重与理解上（而以往则是“四大皆空”）。“走向少儿”已成了新时期儿童文学创作思想与审美意识嬗变的最重要的特征。下面，试从历时性的角度考察一下少年小说系列形象的嬗变过程，这对我们理解新时期儿童文学“走向少儿”的本体意识是有认识意义的。

第一系列：“扭曲型”。其特征是，正视“文化大革命”这场民族劫难对少儿清纯心灵的严重扭曲与污染，使人们看到10年浩劫的斗争哲学与“初级阶段”某些腐败现象的市侩哲学留给下一代的心理创伤，以及医治这种创伤的严重性与紧迫性。属于这类形象的，有不自觉地当了“帮凶”、伤害同龄人人格尊严的露姐（黄蓓佳《阿兔》）；有受庸俗的“关系学”影响心灵变丑而自以为乖巧的金莹莹（刘岩《被扭曲了的树秧》）；有以父母官职高低调整组合小伙伴关系的“精通世故”的干部子女（汪黔初《在县委食堂吃饭的孩子们》）等等。

第二系列：“迷途型”。这一系列的小说提出的命题是：请求社会、学校、家庭理解、信任与关怀正处于转化、迷失或孤独状态中的孩子，而不应冷落、歧视，更不应伤害他们。这实际上是在呼唤孩子世界同样需要人情、人性、人道精神，谴责蔑视少儿人格的某种社会偏见。中年作家刘厚明的《绿色钱包》、邱勋的《三角圆珠笔》、柯岩的《寻找回来的世界》、罗辰生的《白脖子》，最先提出这一问题，在儿童文学领域高扬了人性的旗帜。青年作家常新港的《独船》，通过一个船家独子“独立的心灵世界”遭到父亲蔑视而造成悲剧的故事，向社会大声呼吁：请理解我们的下一代，多给他们一些维系人类群体自身的爱吧！安徒生说过：“爱和同情——这是每个人心里应该具有的最重要的感情。”处于幼者、弱者、被动者地位的少年儿童，较之成人，更需要人类群体的爱；作为感化、纯化、美化孩子心灵的儿童文学，较之成人文学，更需要高扬温暖的人道精神。

第三系列：“自立型”。比之前2类，“自立型”小说对少儿“内世界”的理解与探究进入了更深层次。作家比较正确地把握了处于新的自我开始觉醒阶段的少年的独特心态，并将这种心态置于被心理学家称为“亲子关系隔阂”即所谓“代沟”的矛盾之中，在社会文化背景下，观照少年个性的发展与精神的提纯。刘心武《我可不怕十三岁》中的“我”，力图用自己的价值观和掌握的知识去规范行为，对成年人的指令不再盲目相信与无条件执行。曹文轩的《城堡》塑造了两个完全按照自己意志行事，自己的问题自己判断解决的，具有鲜明自立精神的“小小男子汉”形象。属于同样性格系列的还有《遥遥黄河源》（陈丽）中孤单一人万里寻父，初步接触到人生复杂课题的17岁少年路晔；《弓》（曹文轩）中不要他人施舍、宁可自谋其食的温州弹棉花孩子；《蓝军越过防线》（李建树）中敢于表现自我、摒除形式主义而在野营活动中率先冲上贡戈尔峰的“蓝军”少年张汉光；《从山野吹来的风》（夏有志）中过早经受生活摔打，泼泼辣辣地与风雨搏斗的乡村姑娘秀芸，等等。作家热情地支持了小说主人公初萌的自立、自强意识，表现了当代少年新的健全的文化心理与昂扬进取的阳刚气质。如果说，这些作品是对具有创造性思维的少年自立精神的热情肯定，那么《猪屁股带来的烦恼》（苏曼华）、《我要我的雕刻刀》（刘健屏）、《墨浓力劲的一笔》（张微）、《罗森塔尔效应》（小民）表现的则是此种精神如何在缺乏理解与信任的生活环境中遭受的委屈、压抑与困惑。怎样正确对待当代少年的人格独立性、思维独创性、行动自主性，这无疑是引导他们健全地走向成熟、走向社会的重要课题，对于培育、强化我们民族未来一代精神性格中的创新思维、开拓精神、阳刚气质有着重要意义。因之，“自立型”少年系列形象的出现及其提出的问题，具

有特殊的审美价值。

第四系列：“断乳型”。若说以上3类小说的系列形象侧重于通过人物与外部世界的关系来抒写少年精神的话，那么“断乳型”系列则是切入到处于身心发育突变阶段的少男少女“内世界”的深刻裂变，直接揭示人生黎明风景线的种种隐秘、困惑与求索。现代心理学认为：人的一生有两个断乳期：一是婴儿长大不再吃奶的“生理性断乳”；二是正在走向成熟进程中的少年渴求个体独立的“心理性断乳”；他们开始寻求父母影响不到的小天地，力图脱离大人的“势力范围”，并对其监视作出种种虚张声势的反抗（如陈丹燕《上锁的抽屉》茅晓群《为了没有失去的》）；表现出对异性少年的朦胧情愫，表面回避而内心憧憬的背反现象（如丁阿虎《今夜月儿明》任大霖《人生的青果》罗辰生《少年的心》）；探寻走向人生黎明风景时将会遇到什么样的生活之谜（如韦玲《出门》）。“断乳型”小说把对少儿主体人格的尊重推向了每一个个体，每一个独立存在的精神领域。作家倾心于对天真纯情的少年丰富心理世界的把握，致力于充分个性化和生活多样化的艺术描绘，恰如吹过少年心域的一阵绿风，给人以温暖的人道精神和悠悠不尽的美的遐思。

新时期的儿童文学，尤其是小说，已经把创作视野直接拓展到了人物的“内宇宙”，将审美意识、当代意识与小读者的接受心理互相融合沟通，加快向“人学”的回归，加快走进人（少儿）的领域，帮助引导着年幼一辈完成从“自然的人”到“社会的人”的和谐转化，用以培育出人格崭新、素质优秀的一代公民。这是在摆脱了“成人中心论”的羁縻，确认以少儿内心精神机制为基准的、具有本体意识的儿童文学审美尺度以后所带来的必然变化。

重建人的意识，塑造未来民族性格，这是新时期文坛不断高扬的一种儿童文学美学原则。曹文轩在《中国八十年代文学现象研究》一书中特列专章探讨儿童文学，力倡“儿童文学承担着塑造未来民族性格的天职”^{[4] (P312)}，与此相呼应，汤锐在《比较儿童文学初探》一书中，也特别探讨了有关新时期儿童文学“人的主题”的问题。他们认为，塑造未来民族的性格是新时期儿童文学“主题的核心”；“只有站在塑造未来民族性格这个高度，儿童文学才有可能出现蕴涵深厚的历史内容、富有全新精神和具有强度力度的作品。”^{[4] (P311)}“这是一个充满忧患情绪、强调社会责任感、具有功利性质的观念，是传统儿童文学之主旋律‘树人’观念的延伸和变奏，具有鲜明的民族文化特征”^{[5] (P142)}在“人的主题”的旗帜下，“儿童的一切均指向未来，儿童的存在和意义与民族的生存和意义是融为一体的。”^{[5] (P153)}

新时期以来，儿童文学不时出现的关于塑造“小小男子汉”形象、儿童文学需要“叔叔”型硬汉、需要“阳刚之气”的呼唤，尤其是一大批多角度、多层次描写当代少年成长主题的小说的出现，直接将“人的主题”、“塑造未来民族性格”这一旗帜插上了当代儿童文学创作的峰巅。这些作品是直接对准“承认人的多方面发展的可能性，承认社会应是由丰富丰满的人格结构的个体构成的社会，人的全面和谐发展是成长的首要目标”^{[6] (P397-398)}的。此外，沈石溪动物小说所张扬的生命意识，刘先平大自然探险系列作品所力倡的绿色环保意识，云南“太阳鸟”作家群、辽宁“棒槌鸟”作家群所倾心营造的健美风格与边地特色，其美学追求的总趋向也是指向这一“成长的首要目标”的。我们还应特别提到班马对“儿童性”——儿童生命世界的执著探索。他的小说《鱼幻》《迷失在深夏古镇中》散文集《星球的细语》以及理论专著《前艺术思想》等，就艺术地再现与描绘儿童生命状态、儿童原始思维、儿童生命及原始人类生命的幽秘联系，并从学理层面加以探讨提炼而言，其所作出的努力和所提

出的命题，已成为当代儿童文学一个必须面对和研究的现象，轻易绕不过去。

正是以上种种新潮理论与创作实验的合力作用，极大地提升了儿童文学的价值功能，增强了作家的使命意识、人文担当与社会责任感。这一股南北呼应、东西合流的、不容抗拒的新潮之风，正鼓荡起中国儿童文学美学精神的风帆，向着 21 世纪破浪行进！

三

新时期儿童文学拓展之三：校正了儿童文学标准单一性与创作现象丰富性之间的矛盾错位，确认以少年儿童年龄特征的接受心理的差异性来建构多层次的儿童文学分类，以推进儿童文学创作的发展繁荣。

从 50 年代初期以来，儿童文学理论界曾经围绕着儿童文学的定义、特点、功能等问题进行过无休止的论争，并随着文化背景的变化，与政治问题纠结在一起。进入 80 年代，儿童文学界还在为一些纠缠不清的“问题”搞得不可开交，依然“禁区”重重，创作生产力受到严重束缚。这说明儿童文学肯定还有一个根本性的理论课题没有得到解决——这就是长期以来我国儿童文学界存在的“儿童文学标准单一性”与“创作现象丰富性”之间的矛盾错位。具体地说，就是分别从不同接受对象的角度（如从幼儿的接受能力与审美情趣）出发，以此作为立论依据，去统率、涵盖、要求整个儿童文学的本质特征、价值功能与艺术创造。这就好像“比着箍箍买鸭蛋”，凡是不符合我认定的标尺，就不是“儿童文学”。由此造成了一系列问题的混乱，大家各吹各的号，各定各的调，互不卖帐，互相指责，使儿童文学发展在这个“瓶颈”上卡了壳。

新时期毕竟是变革的年代，改革开放的时代趋势，东西文化的八面来风，当代文坛的迭出新潮，为儿童文学工作者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新的参照系，并形成了自身的主体思维方式和全方位、多维度接纳美学信息的网络结构。接受美学与皮亚杰的发生认识论是这一网络结构中最富于理论价值和启迪意义的变革资源。

接受美学明确提出，文学作品只是为读者而创作、为读者而存在的，只有能被读者理解和接受，才能实现其美学价值和社会功能，变成活生生的艺术。作为儿童文学的接受对象——千百万小读者与大读者一样，他们不是消极的被动的反应环节，而是实现作品功能潜力的主体，是促进儿童文学发展的一个决定性因素。儿童文学对少年儿童来说，并非是被给定的客观认识对象，其价值也不是一个超越时空的常数，而只是一种外部刺激。皮亚杰认为，任何外部刺激，只能通过“同化”与“顺化”两种机能才能得以实现：只有当外部刺激被主体同化于他的认识结构之中，主体才能对此作出反应，从而发生某种改变，即作出某种顺化；如果外部刺激超出了主体结构同化的范围，那么同化和顺化就都无法进行，也即无法整合于主体已有的结构之中。在这里，外部刺激与主体反应之间的关系不是简单的 S-R（刺激—反应），而应当是：S-AT（主体 A 同化刺激 S 于结构 T）-R

很显然，作为外部刺激一个方面的儿童文学作品，只能在适应接受对象主体结构同化机能的情况下，才能进入其审美视野；反之，如果作品与接受对象不具有同构性，也即超出了少年儿童主体结构的同化能力，那么，艺术符号就不能整合于他们已有的智慧结构之中，死信息无法转化为活艺术。由于儿童文学的接受对象是包括了从学龄前（3-6 岁）的幼儿到 14-15 岁的少年乃至 16-17 岁的“准青年”这样一个复杂的未来公民集合群体，由于这个集合群

体中的各个年龄阶段的孩子对各自所需的文学在内容、形式、表现手法等方面有着明显的差异(例如:少年不爱看“奶声奶气”的幼儿读物,幼儿看不懂少年小说、报告文学),因此,儿童文学必须适应各个年龄阶段的少年儿童主体结构的同化机能,必须在各个方面切合“阶段性”读者对象的接受心理与领悟力。这就规定了建立多层次儿童文学分类的必然性与科学性。正是在这样的理论背景下,80年代中期,一个完全不同于传统观念的“新概念儿童文学”登上了新时期文坛——儿童文学是幼年文学、童年文学、少年文学3个层次文学的集合体。不同年龄阶段少年儿童的心理差异与接受机制,决定并制约着幼年文学、童年文学、少年文学各自具有的美学特征及思想、艺术上的要求。这3个层次的文学都有维护自己独立的创作规律与艺术个性的权利,它们都以其自身的文学价值——认识、教育、审美、娱乐与平衡心理的作用,将少年儿童培育引导成为具有健全的文化心理与高雅的精神性格的一代新人为最终目的 [7]

将儿童文学从文学大系统中分离出来,自成一系(在中国,这一工作完成于五四新文学运动时期),这是儿童文学本体意识的第一次自觉;将儿童文学具体区分为幼年文学—童年文学—少年文学3个层次,并界定其各自的审美特征和艺术使命,这是儿童文学本体意识的第二次自觉,是新时期儿童文学观念更新的质的飞跃。在中国儿童文学理论批评史上,这是一个变革,一大进步!无论幼年文学、童年文学、少年文学,都是整个文学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都有其自身的独特的创作规律与艺术章法,都有用自己的理论来保护自己按照自身特殊的文学规律办事的权力,在文学之林中完全有着自己不许被蔑视、不可被剥夺的文学地位与存在价值。这就直接激活了儿童文学被压抑的生产力,直接促发了儿童文学创作多元并存的景观。进入90年代,3个层次的儿童文学观念已成为一种普遍共识,各层次的创作互为呼应,各领风骚,而少年文学更是劲旅突进,成绩卓著。以秦文君《男生贾里》《女生贾梅》为代表的少男少女校园小说,以曹文轩《草房子》《根鸟》为代表的现代少年成长小说,以董宏猷《一百个中国孩子的梦》为代表的梦幻体开放小说,以沈石溪《一只猎雕的遭遇》《红奶羊》为代表的动物小说,以班马《六年级大逃亡》为代表的少年写实小说等,已构成一道绚丽夺目的文学风景线。

茅盾说过:“‘儿童文学’这名称,始于‘五四’时代。” [8] (P396) 在中国,具有现代意识的儿童文学是在五四新文学运动起步的。五四时代,是中国儿童文学的第一次变革,其伟大实践的突出成就,在于儿童观的转变与儿童世界的发现,在于儿童文学第一次从文学大系统中分离出来,成为自觉服务儿童的一种崭新文学载体。以周氏兄弟(鲁迅、周作人)与文学研究会作家群(茅盾、郑振铎、叶圣陶、冰心等)为主干的一大批拓荒者与建设者,直接开辟了儿童文学的现实主义道路,奉献了中国儿童文学的第一批创作硕果与理论收获。站在历史的高度鸟瞰现实,我以为,新时期儿童文学是中国儿童文学的第二次重大变革,它的实践成果与美学尺度,在于儿童世界的再发现与儿童文学主体特征的再确立,在于将儿童文学一分为三——幼年文学、童年文学、少年文学多层次观念的界定与实践。“走向少儿”的新时期儿童文学,必将在实现自我价值与艺术个性自觉的进程中,对培育中华民族未来一辈健全的精神性格、文化心理、国民素质产生日益深广的影响——中国新时期儿童文学深层拓展的全部价值与历史意义即在于此。

参考文献:

- [1] 茅盾 . 六〇年少年儿童文学漫谈 [J]. 上海文学, 1961, (8): 10.
- [2] 曹文轩 . 新潮儿童文学丛书总序 [A]. 中国当代儿童文学文论选 [C]. 南宁: 接力出版社, 1996.
- [3] 文艺报记者 . 首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初评座谈 [N]. 文艺报, 1987- 11- 21 (1) .
- [4] 曹文轩 . 中国八十年代文学现象研究 [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8.
- [5] 汤锐 . 比较儿童文学初探 [M]. 武汉: 湖北少年儿童出版社, 1990.
- [6] 吴其南 . 新时期少儿文学中的成长主题 [A]. 中国当代儿童文学文论选 [C]. 南宁: 接力出版社, 1996.
- [7] 王泉根 . 论少年儿童年龄特征的差异性与多层次的儿童文学分类 [J]. 浙江师范大学学报, 1986, (儿童文学研究专号): 22.
- [8] 茅盾 . 关于“儿童文学” [A]. 中国现代儿童文学文论选 [C]. 南宁: 广西人民出版社, 1989.

Children's Literature in China after 1976

WANG Quan-gen

(Dep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BNU, Beijing 100875, China)

Abstract After 1976, children's literature in China is regarded as having entered the so-called New Period for its liberalness, creativity and profound content. This development has three characteristics. First, children's literature in this period breaks away from the orthodox idea that literature is "an indoctrinating instrument". Instead, writers of children's literature are more aware of their own consciousness and concern of mankind. Second, the adult-centered point of view has mostly disappeared. The principle that children's literature should be in accordance with children's viewpoints and thinking has been reestablished in order to encourage children's awareness of humankind and to remake national character. Third, the tension between the narrow criterion of classification of children's literature and the variety of writing has been reduced. The classification of children's literature based on different ages and different psychological stages has been accepted.

Key words children's literature; profound expansion; developing trends; consciousness of mission; aesthetic pursue

· 《朱子语类》词语拾零 ·

界 方

界方: 镇纸 《语类》卷 33云: “古人之器多有觚 如酒器, 便如今花瓶中间有八角者, 木筒是界方而六面, 即汉所谓‘操觚之士’者也。” (P831) 又卷 53云: “心如界方, 一面青, 一面赤, 一面白, 一面黑。” (P1280) 周密《武林旧事·车驾幸学》: “内官进书案听宣, 以经授执经官, 进于案上……内官进牙界方。” 宋·杜绾《云林石谱·菜叶石》: “汉州郡菜叶玉石出深水, ……土人浇沙水, 以铁刃解之成片, 为响板或界方压尺。” (李敏辞)